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7

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

[意] 费代里科·沙博 著

陈玉聘 译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上海三联书店

非
外
借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7

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

[意] 费代里科·沙博 著

陈玉聃 译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意]费代里科·沙博著;陈玉聘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1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5934-7

I. ①马… II. ①费…②陈… III. ①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Niccol 1469-1527)—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7387 号

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

著 者/[意]费代里科·沙博

译 者/陈玉聘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姚 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021-22895557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8

书 号/ISBN 978-7-5426-5934-7/B·530

定 价/5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主 编 陈 恒 黄 韬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王 旭	王晋新	王晓德
王海利	王晴佳	卢汉超	刘 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 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 强
李剑鸣	杨巨平	杨熙楠	汪民安
范景中	陈 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 淳	林子淳	林在勇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俞金尧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高 毅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 洋	彭 刚	彭小瑜	韩东育
魏楚雄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作者前言

本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原本是我所编纂的马基雅维里《君主论》(Turin, U. T. E. T., Classici Italiani, Vol. XXXV, 1924)的导读。

第二篇文章最早以“关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为题发表在《新历史杂志》上(*Del 'Princip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in the 'Nuova Rivista Storica'*, IX, 1925),其后以同一标题单独成册重新出版(Milan-Rome-Naples, 1926)。这是我所写的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最长一篇文章,不过在本书中,我只撷取与读者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前六章。原文第七章论述的是十六世纪下半叶的反马基雅维里主义,在此就略去了。

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马基雅维里的方法与风格”,该文的内容来自于1952年5月我在佛罗伦萨进行的一次讲座。它最初以“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为题发表在《十六世纪》一书里,后者是“佛罗伦萨文化史自由讲席”丛书中的一本。(Libera Cattedra di Storia della Civiltà Fiorentina: *Il Cinquecento*, Florence, 1955)

本书中讨论文艺复兴的这篇文章,最初以“文艺复兴”为题发表在1942年罗塔(E. Rota)主编的一本内容繁杂的书《历史问题与历史编纂学的方向》上(*Problemi storici e orientamenti storiografici*, ed. E. Rota, Como, Cavalleri),该书再版时更名为《现代历史诸问题》(*Questioni di storia moderna*, Milan, Marzorati, 1948)。

尽管本书中的前两篇文章时日久远,但我的一些朋友还是善意地认为它们仍然颇有趣。对于这两篇文章的整体思路以及它们所表达的基本思想观点,我都不想加以改动,因此除了某些小小的

修正之外,它们将按照最初的面貌呈现在各位之前。在我认为有必要加上脚注的地方,我会使用方括号作标识;但是我特意避免在参考文献上作任何增补。这两篇文章是在特殊年代中构思和写作的,它们涉及那一年代“问题的本质”(the state of the question);因此我期望它们能够完全保持最初的特征。

论述文艺复兴的那篇文章成文较晚,对此文我进行了某些实质性的增补和修改,如果在改动时需要使用脚注的话,我也会用方括号作标识。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彻底修正和重编了参考文献。该文所附的专题文献编排于1942年,作用是协助读者,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初步的引导;在1957年再版时,它显然不应以原貌出现。因此,我不仅更新了参考文献,尽可能地加入了自1942年以来涉及该主题的最为重要的作品,而且还增加了某些1942年以前出版的文献。此外,我还对文章的内部结构作了调整,其目的无非是通过介绍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为读者提供一个入门指引,我期望这些工作会被证明有所裨益,尤其能为学生带来帮助。

我要对大卫·摩尔(David Moore)先生表达最为诚挚的谢意,我的文章风格特异,因此翻译工作必然困难重重,但摩尔先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理解;我也要感谢康纳·费伊(Conor Fahy)博士,他在付印校样阶段给予了宝贵的协助。我还要对我的老友兼同乡登特里维斯(A. P. d'Entrèves)教授^①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论著的英译本之所以能问世,主要应归功于他的个人兴趣。

费代里科·沙博

1957年1月

① 登特里维斯(Alessandro Passerin d'Entrèves, 1902 - 1985),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导 言

沙博教授关于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文章长期以来都是稀缺文献。在我们牛津，了解这篇文章的唯一方式是在博德利图书馆^①阅读1925年的意大利《新历史杂志》(*Nuova Rivista Storica*)——该文的最初发表之处。然而即便如此，牛津的导师们仍不断地告诉一代又一代学习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本科生们：沙博教授的文章在这一领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将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需要什么理由的话，那么上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提供了充足的根据。

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因由，使我多年以来一直期望见到沙博教授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文章能译为英语。我认为，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而且直至如今仍在许多方面可称为马基雅维里研究的里程碑。我还认为，它与近期里多尔菲(R. Ridolfi)所撰写的传记^②一样，极佳地表现了我所谓的对于这位“佛罗伦萨秘书”^③的意大利式的研究方法和诠释方式——它在很多方面都与英语国家^④中那些流行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除了关于《君主论》的文章外，现在的这本书还收入了沙博教授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另两篇重要论文，一篇成文较之更早，另一篇则晚得多。此外，本书中还包括了论述“文艺复兴的观念”的一篇绝妙好文，以及一份真正令人

① 博德利图书馆是牛津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图书馆之一，得名于其赞助人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 1545 - 1613)。——译者注

② R. Ridolfi, *Vit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里生平), Roma, 1954。

③ 即马基雅维里，因其曾担任佛罗伦萨“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译者注

④ 原文为 Anglo-Saxon Countries，主要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具有英式传统的国家。——译者注

叹为观止的参考书目,后者是为译本所特意编排的,我只能期望它不要吓坏了那些对欧洲大陆学术之精妙一无所知的人们!如果需要找到一条串联起上述各篇文章的线索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引用沙博教授的一句评论:“关于文艺复兴及其历史意义的任何观点,都可以在马基雅维里这里得到真正的检验。”

我刚才提到了对于马基雅维里的意大利式研究方法。沙博教授的著作最好置于意大利史学研究,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背景下来理解——当然,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作品的重要性有任何轻忽之处。在克罗齐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沙博教授关于过去五十年间上述领域的研究趋势做出了十分有趣的考察。^①就此卷英译本中的诸篇文章而言,我想我们找不到比他本人的这篇论文更好的导读了。

沙博教授指出,意大利人总是觉得,文艺复兴问题是自身历史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他们始终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意大利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时代,恰恰是意大利失去“自由”的时期,外国势力也正是由此确立了在亚平宁半岛的统治地位。当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而重新觉醒之时,即浪漫主义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②的年代,意大利历史学家们敦促自己为这一悲剧性的矛盾寻找解释。在他们看来,文化史和政治史不应被当作两个截然相隔之物分别对待。对这两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所做出的判断,都必然影响到对另一个领域的判断。即使冒着曲解史料的风险,整个历史也必须被重写,而文艺复兴或者是被彻底斥责为遗祸无穷,或者是在时间上被前推至意大利之伟大的“真正”

① F. Chabod, *Gli studi di Storia del Rinascimento*, in *Cinquant'anni di vita italiana*, 1896—1946. Scritti in onore di Benedetto Croce per il suo ottantesimo anniversario. (“关于文艺复兴历史的研究”,载于《意大利思想生活五十年, 1896—1946——为贝奈戴托·克罗齐八十华诞向其致敬之文集》) Napoli, 1950. Vol. I, pp. 125—207. (经查该文集标题应为 *Cinquant'anni di vita intellettuale italiana*, 1896—1946, 英译本疑漏去 *intellettuale* 一词。——译者注)

② Risorgimento 意为“复兴”,特指 19 世纪意大利人为争取独立和统一而进行的复兴运动。——译者注

时期,即拥有自由公社与海上共和国^①、产生了但丁这样的伟大与卓越人物的时代。对意大利历史如此情绪化的重新思考,也清晰地回荡在在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诠释中。学者们或是如卢梭、阿尔菲耶里和福斯科洛^②这样,将马基雅维里转化为自由的倡导者和暴君的谴责者;或是如德·圣克提斯^③所做的那样,为马基雅维里的“反道德”主义进行辩护与粉饰,称之为照耀其前路的“神圣的爱国主义光辉”。

与这种对于过去时代颇具浪漫色彩的理想化和美化相反,现代意大利学者们在过去五十年中宣称要实事求是、科学研究。“在更为冷静的历史视野中,民族激情不再是压倒一切的力量,或者至少不再带有如此直接的暗示。一旦独立与统一得到维护,人们在审视历史时就能少有成见;失去独立以及失去对独立的强烈渴求,这两者都不再被视为罪恶。人们不再要求过去的时代必须预见到‘复兴’的崇高理想;这些理想也不再被作为历史评判的标准。学术意见既已有了这种新的氛围,文化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联系即使没有被完全割断,至少也已大大削弱;人们不再觉得,为了理解彼特拉克的诗歌、马萨乔的艺术或瓦拉的思想,就必须诉诸公社自由的理想,阿里奥斯托^④诗节中的美妙和谐也不再被认为反衬着十六世纪初期意大利人的卑鄙与无知——而在过去人们必然是这样解

① 在意大利中世纪的分裂状态下,自由公社与海上共和国都是常见的地方自治形式,前者如帕尔玛,后者如威尼斯、热那亚等。——译者注

②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Victorio Alfieri, 1749—1803),意大利戏剧家;乌戈·福斯科洛(Ugo Foscolo, 1778—1827),意大利诗人、作家;两人都对马基雅维里多有称赞,死后也都葬在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与马基雅维里的墓碑比邻而列。——译者注

③ 弗朗切斯科·德·圣克提斯(Francesco De Sanctis, 1817—1883),意大利著名学者、文学理论家,其所著《意大利文学史》一书具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④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英文作 Petrarch,意大利诗人,十四行诗的集大成者;马萨乔(Massaccio, 1401—1428),意大利画家;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6—1457),意大利古典学者、思想家、修辞学家;卢多维科·阿廖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代表作为《疯狂的奥兰多》(一译《疯狂的罗兰》);以上四人均均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释的。”^①换言之，文艺复兴不再表现为某种仅限于意大利的事物；源自于意大利土壤的各种观念，不论是好是坏，其变化发展都开始被视为某种欧洲共有之事，而不只对意大利意义非凡。在意大利，布克哈特的观点^②也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其中的某些论点随着历史研究的进步已遭到反驳，他的思想仍深具影响。兹举一例：虽然君主国（Signorie）^③的崛起早已被证明是漫长历史过程的结果而非有“能力”（virtuous）^④的君主的创造物，但文艺复兴国家是“一种艺术工作”（a work of art）的提法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仍为人们深信不疑。

然而，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也无法全然否认：意大利人对于文艺复兴问题有着特殊的关怀。当人们讨论“意大利”对于欧洲“现代精神崛起的贡献”时，当他们试图在视觉艺术乃至哲学、宗教和政治等领域分析和界定这种贡献的本质时，他们都清楚地体现出了这样的关怀。就此而言，克罗齐的论断无疑是最令人惊异的，他认为，有一位意大利人奠定了“政治哲学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这一功劳属于马基雅维里，后者“发现”：“政治具有必然性和自主性；政治超越善恶——这样的政治有着自己的法则，反抗其法则是徒劳的；这样的政治无法用圣水从世界上祛除扫净。”^⑤

于是，克罗齐仅用寥寥数笔，便推翻了长久以来关于马基雅维里“反道德性”的谴责。人们习以为常地用来对这个意大利人以及对文艺复兴进行负面评价的论据，转眼却成为了意大利最伟大的

① F. Chabod, *Gli studi di Storia del Rinascimento* (关于文艺复兴历史的研究), p. 136.

②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开篇便谈论当时的各种国家形态，其标题即为“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

③ Signorie 是 Sigoria 的复数，为“管辖、支配”之意，特指文艺复兴时期的某种常见的意大利城市国家政体，它有别于城市共和国的民主形态，由一个最高统治者进行治理，但其权力又并非是绝对的，如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的佛罗伦萨即可归于此类，这里译译为君主国。——译者注

④ 英译本此处为加上引号的“virtuous”，显然并非用其字面意思“有美德的”，而是来自于马基雅维里的 virtù 一词，侧重于君主的“能力”。——译者注

⑤ B. Croce, *Elementi di Politica* (政治的要素), Bari, 1925, p. 60.

成就之一。事实上,克罗齐指出,正如所有那些发现了苦涩真理的人们一样,马基雅维里深深地意识到,在机敏探究与无情求真之下,自己正揭示出某种悲剧性的困境。不仅如此,克罗齐甚至提到了马基雅维里心中一种“严峻而痛苦的道德认知”,例如,“他带着揪心的酸楚强调政治的概念及其固有的必然性”,他梦想着那也许存在于古代或仍存在于阿尔卑斯山未开化居民之中的“良善社会”,他避而不谈史上所载的惊悚之事,又劝诫人们遵循过去的良善榜样而非邪恶之例——从中人们都可以发现马基雅维里的这种“道德认知”。但非常明显,克罗齐的论述,整个重点全在于假定马基雅维里有所“发现”:这很可能是在重复培根的观点——“我们都应当深深感激马基雅维里”。^① 克罗齐并没有转而探索:在马基雅维里的敏锐目光之后隐藏着何种悲惨的经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为了“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当时及此后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克罗齐的这些思想对此后意大利学者研究马基雅维里的论著产生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在沙博教授的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所留下的痕迹;克罗齐辩称,“政治的自主性”是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科学的重要贡献,而沙博在写下上述论文数十年之后,明确地承认道,自己从克罗齐的观点中获益匪浅。^② 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得以避免很多克罗齐信徒身上所存在的简化无度的错误。后者中的一部分人仍在无休止地谈论“超越善恶”的“政治本性”,而沙博则回归早期的传统,将马基雅维里及其学说视为意大利历史中的关键时刻。最近一段时期,意大利国内的马基雅维里研究和文艺复兴研究体现出了一种政治史和文化史相互分隔的倾向,沙博教授却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强调两者间的密切联系。旧时的浪漫主义理论,错在将这种联系看成是因果性的;然而否认两者之间的因果依存,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忽视存在于理论与实践以及存在于“意识形态”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

① 引自培根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论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第二卷。——译者注

② F. Chabod, *Gli studi di Storia del Rinascimento* (关于文艺复兴历史的研究), p. 154。

联。用沙博教授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目的是“在马基雅维里这位《君主论》作者的身上来展现——甚至几乎是综合——纵贯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生活;观察从古老的公社自由之没落到君主的绝对国家之兴盛这段长久的发展过程——它正是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得以反映和澄清,展现出自己原本的脉络”^①。

沙博教授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完成了他为自己所设定的这个目标,那不应由我在这篇短小的导言里作出评判。仅就其关于《君主论》的文章而言,我几乎无需指出,在三十余年中产生了太多的论著,它们或是证明,或是质疑这篇文章中的某些结论。但这丝毫也不能让我们忽视沙博观点的新颖与新鲜之处,这种新意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销蚀。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中的某些章节——我想尤其是“意大利历史所展现的‘往事之鉴’”——已经在文艺复兴历史的研究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关于沙博教授对马基雅维里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我斗胆想要对他自己的评价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如我所言,他认为自己的贡献是在马基雅维里和文艺复兴的问题上有意识地回归旧时的“浪漫主义”的方法,即认为“文化的”和“政治的”历史不应当被相互割裂。但沙博教授却急切地指出,他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学者不同,对于“他们所如此重视的道德考虑”并无兴趣;他还指出,自己刻意想要避免“在其时代的框架中”对于马基雅维里做出任何辩护或谴责。

我承认,我无法理解沙博教授为何采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他自己对于马基雅维里之教诲的精妙重构,除非这是出于对克罗齐的敬意。实际上,正是他在自己所叙述的故事和所争论的问题中所表现出的个人关怀,直至今日仍给予他的著作一种深沉的哀婉色彩。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评价意大利历史上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悲剧性意义时,他全然忘记了“政治的自主性”。就个人而言,我不禁感觉到,在关于《君主论》的文章第四章的结尾之处,他为马基雅维里的这部作品写下了自己的真正结论:“其他作品……显示出在那时的欧洲,新的生活正破土而出。《君主论》则在想象力的丰富和戏剧

① F. Chabod, *Gli studi di Storia del Rinascimento* (关于文艺复兴历史的研究), p. 154。

性的强烈方面远胜同侪，却是一个辉煌的时代穷途末路、黯然消逝的见证。因而，《君主论》既是意大利两百年历史的浓缩总括，也是对它的批判谴责；触动评论者心灵的，远不该是所谓的反道德性，而应当是思及我们意大利文明的命运所遭逢的无边苦难。”^①如果我没有全然误解作者，那么在这几行文字中包含着一个判断——实际上是一个“道德的”判断，它使人不再易于相信，意大利人对于马基雅维里的治国方策具有某种愤世嫉俗的自傲感。

不过，在诠释马基雅维里及其时代这一问题上，这种情绪化的介入方法也可以为帮助我们发现意大利方式的另一特征。沙博的论著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特征，那就是，在评价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时，研究者们倾向于聚焦在《君主论》一书上。我想，阅读沙博此书诸文的英国读者们必定会心生异议：为何作者对《论李维》——如果并未真正轻忽或无视的话——给予的关注如此之少？为何作者所强调的完全是马基雅维里作为绝对主义理论家的一面，强调他正在“为欧洲绘制它两百年历史的蓝图”，^②而全然不曾考虑马基雅维里的另一面：一个对古罗马或当时的瑞士城市所具有的自由政制充满向往的共和派？关于这类问题，迅速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第一个答案便是：毕竟本书的核心文章，^③其主题就是《君主论》；书中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君主论》导读”，第三篇文章则研究“马基雅维里的方法和风格”，而并非是关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但我必须承认，将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分割为“早期”和“晚期”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做出论断，这样的做法并不会令人满意，因为沙博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诠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君主论》和《论李维》两书成文时间的详细推定；^④而他的诠释接下来又

① 见本书英译本第105页（中译本第103—144页。——译者注）。

② 见本书英译本第120页，注释1（中译本第118页，注②。——译者注）。

③ 指本书中收录的第二篇文章。——译者注

④ 沙博推断，《君主论》成文于1513年7月至12月10日之间，现在这一说法已被普遍接受，并且从未受到过实质性的挑战。很遗憾，他就此问题所进行的精妙讨论无法被收入此书，见 *Sulla composizione de 'Il Princip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论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写作），in ‘Archivum Romanicum’，XI（1927），pp. 330—383。

关联着这样一种假定：马基雅维里的两部著作不论在构思和写作上都密切相关。在不久之前，《论李维》写于何时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①从而“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的最终论说”这一问题再次被推向了前台。我们将会看到，人们所追寻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作为“绝对主义者”的马基雅维里和作为“共和派”的马基雅维里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

但重要的是，沙博对于《君主论》的解读仍然价值非凡；或许它还能提醒我们，在对于马基雅维里之历史意义的评价中，什么才是真正引起争论的问题所在。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以及《论李维》的“人文主义”或许具有毋庸置疑的分量，甚至对于研究文艺复兴晚期的政治思想或是“佛罗伦萨人对于共和国向君主国转型的政治认知”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②但是，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人们心中所挥之不去的印象，并非是一位学者为李维撰写了一部才华横溢的评注，而是一位政治家无情地揭露了权力政治这一肮脏游戏的规则。“Machiavellis Lehre war ein Schwert, das in den staatlichen Leib der abendländischen Menschheit gestossen wurde und sie aufschreien und sich aufbäumen machte.”^③如利剑般刺入我们祖先道德良知中的这种学说，存在于《君主论》之中，也存在于《论李维》那些包含了纯粹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篇章之中。相较于其他国

① 我所提到的这一争论始于吉尔伯特的文章[F. Gilbert,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Machiavelli's 'Discorsi'*,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IV (1953), pp. 136 - 156];最新的发展则可参见当前巴伦的一篇文章[H. Baron, *The 'Principe' and the puzzle of the Date of the 'Discorsi'*, in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XVIII (1956), pp. 405 - 428]。

② 这个提法来自于阿尔贝蒂尼最近一本著作的标题，他的这项研究非常出色(R. von Albertini, *Das florentinische Staatsbewusstsein im übergang von der Republik zum Prinzipat*, Bern, 1955,佛罗伦萨人对于共和国向君主国转型的国家认知，见第53—74页关于马基雅维里的部分)。

③ 德语：马基雅维里的理论是一把利剑，它刺入了西方文明的政治机体之中，使之呼号抵抗。——迈内克。F. Meinecke,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在现代史上的国家理由学说)，2d ed., München und Berlin, 1925, p. 60。(本书有时殷弘先生中译本：《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译者注)